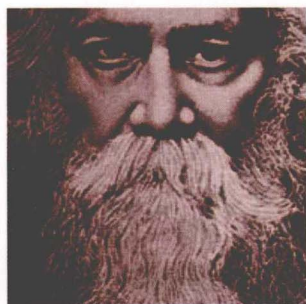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of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di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TAGORE AND CHINA

泰戈尔与中国

主编 ● 王邦维[中国] 谭中[印度]

译审 ● 阿密亚·德武[印度]

副主编 ● 魏丽明[中国]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AGORE AND CHINA

泰戈尔与中国

主编 ● 王邦维^[中国] 谭中^[印度]

译审 ● 阿密亚·德武^[印度]

副主编 ● 魏丽明^[中国]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与中国 / 王邦维, [印]谭中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17-0527-3

I. ①泰… II. ①王… ②谭… III. ①泰戈尔, R. (1861~1941)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1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3065号

泰戈尔与中国 / 主编 ● 王邦维 [中国] 谭中 [印度]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邓 彤
特邀编辑 哈若蕙 戎爱军
装帧设计 吴海燕 冯艳青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353(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66130345(网络销售)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前言 FOREWORD^①

[印度] 拉奥琦 / Nirupama Rao

获悉北京大学将于2010年8月主办一场泰戈尔国际研讨会并出版一卷关于“泰戈尔与中国”的论文集，我非常高兴。我认为，这场研讨会对于推进印中之间的友谊和理解将大有裨益。

泰戈尔不但是印度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1913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东半球萎靡不振之时，他的创造性天才和他对亚洲文明价值观念的信仰，给予印度人、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以希望。早在1915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即已将泰戈尔获奖诗集《吉檀迦利》选译为中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的一二十年间，在中国享有如同泰戈尔那样声望的作家郭沫若，于1914年至1920年间留学日本时就深受泰戈尔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早期诗作中一再向泰戈尔致礼并对“和平之乡”（Santiniketan, 泰戈尔在孟加拉的学园）表示向往。

泰戈尔于1924年四五月间在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巡回演讲。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中国听众说：“你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灵魂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培育出来的。你们所以成为历史至为悠久的民族，是因为你们有许多世代积累起来的智慧，而这样的智慧源于你们对善的信仰，而不是仅仅出于对力的信仰。这就使你们拥有非同寻常的历史。”

在居留北京期间，泰戈尔在中国的主人们为他的63岁生日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为他取了中国名字“竺震旦”。泰戈尔深受感动。他在暮年写的一首诗中对于那一盛事仍记忆犹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刘建译。

我曾踏上中国的大地，
 以前未尝谋面的人们，
 将友谊的标记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
 陌生人的外衣消失，
 从中露出，
 一个永久的我。
 一种意想不到的欢乐友谊，
 我获得中国名字，穿上中式衣服。
 我心里早就知道，
 无论在哪里找到朋友，我就会在哪里重生，
 是他为我们创造生命奇迹。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早期思想家之一。他加强了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互惠互动关系，他强烈主张重新开通两国之间已被荒草覆盖的道路。他非常热情地促进我们两个民族之间在现代的友谊和理解。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在发展印度的中印研究方面起了先驱作用。在圣地尼克坦（和平乡），先是中印学会的成立，继而是中国学院(Cheena-Bhavana)的建立，为这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在谭云山的领导下，中国学院为现代印度了解中国文明及其在现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已经作古的季羨林，印度政府莲花奖的获得者，中国印度研究的泰斗认为，泰戈尔在印度和中国都是中印友谊的象征。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接受国际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之时在圣地尼克坦说：

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一九二四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深受泰戈尔热衷于印中友谊情怀的熏陶，他的信念是：印中深厚的文明亲属关系在历史上以高尚精神形成两大民族的相互交融。正是这种文明亲属关系激发出潘查希拉Panchsheel（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欣慰地获悉，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泰戈尔和尼赫鲁一直位于对“中国近现代发

展”影响最大的50名外国人之列。

泰戈尔是个具有远见的人，始终在向前看。他于1924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正是我们恢复自己的光芒万丈，冲破风暴乌云，照耀人生道路的亚洲的自豪感的大好时光。”他还说：“我希望有一位宣扬爱心，克服一切障碍，沟通数世纪日益扩大的鸿沟的这样的伟大梦想家从你们中间出现。”

我觉得，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就像是针对今天的印中两个民族说的，在召唤我们为两国之间更加深入地理解对方而努力。在纪念泰戈尔之时，我们需要再度鼓起勇气，增强信心，以推动我们两国内部的和谐发展，从而增进我们的地区和世界的福祉。

凡是为泰戈尔提倡的促进印中友谊与理解而献身的人们都永远受到泰戈尔的“永久显露一种意想不到的欢乐友谊”的不朽语句的鼓舞，祝愿印度与中国上升到两国之间文明智慧及友好伙伴关系的更高层次，占人类40%的我们两大国家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携手前进，发扬“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的理想。

2010年2月于新德里

拉奥瑞：印度政府外交秘书（常务副部长），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

序言 *PREFACE*

[中国] 王邦维 / *Wang Bangwei*

在今天的中国，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印度名字，除了释迦牟尼以外，大概非泰戈尔莫属。释迦牟尼是佛祖，两千多年前，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就知道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对于释迦牟尼，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当然怀有最大的敬意。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释迦牟尼是佛，也就是神。泰戈尔则不一样，他在世的时间，不过是百来年到几十年前。在中印之间两千多年交往、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泰戈尔对我们来说，时代很近，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实在，更亲切。在释迦牟尼的身上，我们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崇高的神性，而在泰戈尔身上，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则是一种伟大的人性。

对泰戈尔，人们有许多称呼：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这些称呼当然都很对。不过，在我看来，泰戈尔最根本的，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对人类、对生命的普遍的爱，对自然出自内心的亲近。泰戈尔的身上，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泰戈尔追求的，是人类的平等、世界的和平、精神上的完美，即便这不一定合乎时宜，即便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不平等，也很不完美。泰戈尔创作的所有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发表的无数的讲话，他所有的社会活动，无不与此相关。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种精神上可以追求的目标。因此，说泰戈尔是印度的圣贤，是亚洲的圣贤，也是世界的圣贤，我以为毫不过分。

对于中国人来说，认识泰戈尔和泰戈尔的思想，曾经有一个过程。从最早因为泰戈尔以亚洲人的身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觉是为东方人争了光，我们中国人也“与有荣焉”，到泰戈尔访华，不同的人，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界引起种种激烈的争议，再到中日战争爆发，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谴责，让我们终于觉得泰戈尔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其实，依我的看法，这中间泰戈尔自己在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个世界，更多的还有我们理解问题的角度和某

些思想观念。

如果更仔细地想，真正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就是如此。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泰戈尔思想的重要与价值才逐渐被显现出来。当然，这也并不奇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思想观念，它们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一些思想，一些观念，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区也许会有用，也会有一定的价值，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或者再放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检验，最后的结果，有一些会被人们放弃，有一些会被人接受，也有一些曾经被怀疑，但最终证明其价值。后者就会具有历史的意义，普世的意义，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更有影响的生命力。

我们说，泰戈尔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泰戈尔的思想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觉有必要重新讨论泰戈尔的思想，原因不就在这儿吗？对于泰戈尔，我们过去有过尊重，但也不是没有过误解，尊重自然是对的，发生误解在当时也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开展新的讨论，获得新的理解，可以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这样做，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还是对于当今的现实，我以为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为了纪念泰戈尔，同时也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两年前，在跟哈佛大学的Sugata Bose教授及纽约城市大学的Tansen Sen教授商议以后，我们决定在2010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召开纪念泰戈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题目是“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Understanding Tagor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Research）。北京的这个会议，与2009年11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泰戈尔的亚洲观念与他的时代”（The Idea of Asia in Tagore and His Times）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5月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召开的“行动的时代：泰戈尔的亚洲之旅”（An Age in Motion: The Asian Voyages of Rabindranath Tagore）国际学术研讨会互相呼应，成为纪念泰戈尔国际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为了北京大学的这次会议，我们也接受了谭中先生的建议，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

中国和印度，有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对于中国人，印度曾经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或者神奇的地方。印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人：释迦牟尼、大雄、商羯罗、伽比尔、甘地，甚至包括阿育王、阿克巴这样开明的君主。泰戈尔是其中最晚近的一位。今天的印度，虽然已经不再神奇，但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我们实在是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可惜这在过去一直做得不够。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愿意与更多的关心中国和印度的朋友们一起，努力地推动中印友好，了解中印的文化，发展中印的经济。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意义，其实不限于中印两国本身。中印的人口加起来，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两个国家的事情办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小半也就差不多办好了。

感谢本书所有的撰稿人，其中应该特别提到阿莫尔多·沈（Amartya Sen）教授。阿莫尔多·沈也是印度孟加拉人，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在泰戈尔的“和平之乡”度过。他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国际上被称作“为穷人说话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当今并不多，因此非常伟大。几年前因为参加为重建那烂陀大学而成立的顾问小组（Nalanda Mentor Group）的工作，我认识了他。他是我们顾问小组的主席。他对中国十分友好，这几年，我们多次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到印度，也谈到中国，每次他总有很精辟的意见。他还写了不少的文章，也有书，讨论中印文化。他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是书中的精华。

我们还要感谢的是谭中先生，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主要由他完成。同时也感谢协助他做英文编审的德武教授（Amiya Dev）。谭中先生是谭云山先生的哲嗣，今年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谭中先生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为增加中印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做了许多工作。在近代中印交往的历史上，谭云山是跟泰戈尔有过最密切接触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于中印文化的沟通，两位谭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泰戈尔的研讨会，谭中先生实际上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筹划和联络工作，我们非常感谢。

最后，我想用季羨林先生讲过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泰戈尔和中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一生的活动对加强中印两国人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亲身访问过中国，也曾邀请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访问，从而促进了两国人们的相互了解。这种相互的访问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①

我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以纪念泰戈尔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季先生讲的中印友谊的花朵将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灿烂。不仅如此，由此我还希望，泰戈尔人道主义的精神和观念，以及他世界大同的理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2010年7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王邦雄，现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这三个研究机构的主任。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瑞典、日本及爱沙尼亚出版过学术著作或发表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佛教历史和文献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2007年为在印度重建那烂陀大学而成立的国际那烂陀顾问小组的成员。

①《季羨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五卷，181页。

导言一 INTRODUCTION

[印度] 谭中 / Tan Chung

“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别处，另外的地方。”您现在在哪儿？亲爱的师尊！

我们爱您，师尊！我们称您“Rubi兄”！我们跟随您朝圣，朝向“国际人类”以及更远更远！

我们再一次宣布坚定的信念：您热爱中国，中国也热爱您。十四亿中国人说“泰戈尔属于我们”，正像十亿印度人说“我们的泰戈尔”。

我们趁着两大节庆出版这本《泰戈尔与中国》。第一大节庆是纪念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第二大节庆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建交60周年。泰戈尔是连接两大事件的纽带，是两国之间的金桥。

我们纪念并推崇泰戈尔突出中印两大文明的历史贡献以及勉励两个现代国家——中国和印度——重振伟大历史事业。1939年12月，泰戈尔欢迎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来到圣地尼克坦时强调“文明的新生”不能靠“强力拼个死活”，而是来自“内心的情感”。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古代是这样过来的，“共享了伟大文艺复兴的黎明”。他“殷切希望我们两大邻国亲属情谊的新时代”来到，强调了中印合作“重振东方的历史力量来把人类从四处袭来的黑暗中拯救出来。”^①

我们纪念并推崇泰戈尔因为他是现代中印友谊的灵感。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1961

① 达斯Sisir Kumar Das编：《泰戈尔的英文著作》*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新德里：印度政府文学院出版，1996年，第三册，850页。

年纪念泰戈尔诞生百周年时写道：圣雄甘地是“像雷电一样使我们大家震撼”，泰戈尔却“渗透到我们之中”。尼赫鲁这样描写自己：“我属于在泰戈尔影响下成长的一代。”^① 尼赫鲁继续说：“泰戈尔的印度性毋庸置疑，他的思想实质上是国际主义模式。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变成狭隘的教义的。”^② 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第一次演讲中说：“我想起当年印度把你们当作兄弟。”^③ 他是现代印度第一个相信印度与中国人民是“兄弟”的人。他对尼赫鲁的影响加强了尼赫鲁本人创造对中国特殊友好关系的理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Hindi Chini Bhai Bhai”（印度和中国人民是兄弟）的高潮。泰戈尔的灵感通过尼赫鲁传给兰密施（Jairam Ramesh）（现任印度政府环保森林部长），发明了代表中印两国所有佳话的象征符号的新英文字：“Chindia”（中印大同）。

我们纪念并推崇泰戈尔1924年访华——阿莫尔多·沈（Amartya Sen）称之为“Tagore's grand visit to China”（泰戈尔对中国的伟大访问）——是国际文化交往地平线上刮起的春风。徐志摩写给泰戈尔的信说：“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艳的蓓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您是风露之源，您的诗作替我们的思想与感情加添了颜色，也给我们的语言展示了新的远景。”本书文章中所引泰戈尔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他在中国的讲演，那可是智慧与远见的宝库，在当前我们思想混乱与迷失方向的时代特别值得认真思考与重新诠释。本书多数作者在各自探讨泰戈尔与中国的课题时都提到泰戈尔访华。本书第二部分，北京大学亚非系主任魏丽明教授的《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历史意义》一文，不但对这一事件作了全面介绍，还详细讨论了它的历史意义。

很多当代泰戈尔专家为本书撰文。我的至友邬玛·达斯古普多（Uma Das Gupta）教授是我的泰戈尔问题导师。她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研究项目，即收集并分析所有泰戈尔有关中国的言论。这一项目完成以后将会对史科学做出巨大贡献。她在本书第三部分的开创性文章：《国际大学的中印学研究：中国学院建立经过（1921-1937）》是从来没人写过的，使得印度的中国研究的诞生与启蒙的来龙去脉得到一目了然的介绍。随后的文章是泰戈尔文学专家、不久前刚退休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博物馆的资深馆

① 尼赫鲁：“序言”，参见《泰戈尔诞生百周年纪念集1861-1961》*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61: A Centenary Volume*，新德里：印度政府文学院出版，1961年，第13页。

② 尼赫鲁：“序言”，参见《泰戈尔诞生百周年纪念集1861-1961》*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61: A Centenary Volume*，新德里：印度政府文学院出版，1961年，15页。

③ 达斯编：《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加尔各答：国际大学泰戈尔博物馆出版，1999年，48页。

长沙潘·摩炯达（Swapan Majumdar）教授所作。他写的《朝东看：泰戈尔宇宙思想中的中国》是世界各国所有发表过的有关泰戈尔对中国的看法的评论中写得最详尽透彻的。邬玛和沙潘这两篇文章是从“地缘文明”的观点来看中印关系发展的，特别是文化的交流，虽然没有用“地缘文明”这个词。

谭中一直是不厌其烦地提倡“地缘文明范式”的，他试图通过泰戈尔和年轻有为、但不幸过早夭折的中国诗人徐志摩之间的令人感动的友谊来开展“地缘文明范式”的探讨。他的文章，《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得到了泰戈尔专家，特别是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和阿密亚·德武（Amiya Dev）教授，再加沙潘·摩炯达教授的大力帮助。谭中文章中对一件中国珍藏的文件的无意的重要发现就是他们的功劳，特别是德武教授的功劳。现在已经清楚了，徐志摩和陆小曼所珍藏的一张纸片上手写的泰戈尔的孟加拉文诗，不是泰戈尔的亲笔，而是一位年轻孟加拉诗人——1929年与泰戈尔同行赴东亚与北美访问的杜特（Sudhindranath Datta）所写。这样一来，所有关于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家做客的报道，特别是中国报刊上登载的，都得修改了。

本书泰戈尔和徐志摩“*bhai-bhai*兄弟”的故事又延伸到泰戈尔和谭云山之间的友情故事，是谭云山的儿媳黄绮淑写的《泰戈尔与谭云山的中印友好情结》。这篇文章对邬玛的文章来说是扎实的补充，也加强了其他许多文章中提到的谭云山的历史作用。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写作之时，正值印度总统帕蒂尔访华，她在2010年5月28日在北京欢迎招待会上讲话时就提到谭云山对中印友好与理解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第五部分收入阿密亚·德武教授的文章：《泰戈尔对东方的宏伟愿景》，谭中写了《深刻认识泰戈尔与中国、亚洲的情结》对它进一步补充。这两篇文章突出了泰戈尔对东方的宏伟愿景以及中国与日本对现代西方挑战的不同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当中国正在崛起为强国，又自觉地不愿意变成受人惧恨的超级大国，而是博得别国的敬爱。两篇文章都突出了当年泰戈尔的忠告的时宜性。

本书第六部分“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共鸣”是针对泰戈尔是大文豪与诗人而和爱好文学的读者共同商榷。书中有曾琼博士《泰戈尔对冰心的影响》文章，写出一个生动的故事。随后是谭中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泰戈尔的影响》，试图探讨泰戈尔作品与全球闻名的唐宋诗歌的共鸣现象，是明知会引起争议的抛砖引玉，它算是达到了目的，引出了德武教授的《泰戈尔与中国古典歌曲》和伊普喜达·钱达Ipshita Chanda教授的《歌手的“春风语流莺”》两篇评论。谭中回应他俩批评的话附在这两篇文章的末尾。我希望世界上，特别是中印两国的文学爱好者由这一辩论带动而参加到这一思想探讨中来，这样就可以加深中印文化交往，并对比较文学作出贡献。

最后，但也是重要的，本书的压轴戏是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群体、民族及持久性：泰戈尔并未过时》文章为中心的关于“泰戈尔的时宜性”的专题讨论，有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吴萍茜（Patricia Uberoi）教授和莫汉迪（Patricia Uberoi）教授参加。这四人中有三位印度的中国通。当然，杜赞奇属于美国，现在也属于新加坡。他在印度出名，在中国更出名。他的书都被译成中文，书的中国读者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多。我想本书读者会认真思考这一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

已经谈到本书的压轴戏，但本书还有隆重的揭幕式，那就是阿莫尔多·沈 Amartya Sen（传媒平常译为“阿玛尔迪亚·森”不是孟加拉语发音）教授特地为本书写的文章。本书的读者对阿莫尔多·沈是熟悉的。事实上，半年前当阿莫尔多·沈答应为本书撰文时，我的友人，特别是中国友人，高兴得好似得了大奖。阿莫尔多·沈在中国的崇拜者与在印度以及孟加拉国同样多。使人惊叹的是：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作为一个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却出了两位诺贝尔奖金得主：泰戈尔1913年得文学奖，阿莫尔多·沈1998年得经济学奖。在很多方面，阿莫尔多·沈很像当年的泰戈尔。他像泰戈尔那样对人类的命运深切关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也有强烈的正义感，提倡平等与全球爱心。泰戈尔当年马不停蹄地旅行、讲演，但泰戈尔的旅行以及受听众欢迎的程度和今天的阿莫尔多·沈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非常幸运，他没有像拒绝无数崇拜者的要求那样拒绝本书的要求。阿莫尔多·沈教授为我们写的《泰戈尔与中国》文章与他在《纽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1997年6月26日刊载的文章以及他2005年出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一书的第五章“泰戈尔和他的印度”（Tagore and His India）形成阿莫尔多·沈论泰戈尔的三部曲，成为泰戈尔历史资料的经典性文件。我们高兴地将它奉献给本书读者。

王邦维教授是我们这一出书事业的主人，他是我亲近的好友，因此我不必拘守仪礼感谢他写“序言”。可是，我必须感谢拉奥琦（Nirupama Rao）女士，虽然她也是我好友。她对本书有两大贡献：一是帮忙劝说阿莫尔多·沈教授为本书撰文；二是为本书写了“前言”，虽然她作为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是很难抽出时间来从事非官方的杂务的。中国人民在她两任职务中，即2006至2009年担任印度驻华大使与现今主掌经营印度外交政策（中国在这政策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岗位上都敬爱她。本书读者一定会喜欢她对泰戈尔、对中印友好及了解的富有感情的话。

我如果在这“导言”中不感谢我的合作者德武教授对我的珍贵帮助，那就没有尽到责任了，虽然他也是我至友，又是不拘泥于仪礼的人。我和他已经在编《科学、文学与美学》*Scienc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一书（是《印度文明中的科学、哲学与

文化的历史》巨型丛书的第十五卷、第三部分，新德里2009年出版）时就有了一轮合作。在当前这一轮合作中，他起初是热忱的作者，后来变成我的更热忱的合作者、军师与指导。没有他的帮助，中英双语的本书是无法达到现在这样高水平的。我们之间分歧很多，但我们的合作无间是根据泰戈尔说的“让我们团结起来，不是避开我们之间的分歧，而是在分歧上取得团结”的精神。正像泰戈尔所说，“没有分歧，生活就会显得太乏味了”。本书内容如此丰富，正是由于两位合作者——德武与我——分歧碰撞的火花造成。

2010年7月 芝加哥

谭中，2010年印度政府二等莲花奖获得者，他是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羨林2008年以后第二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学者。他出生于马来亚，在中国长大，他生命的黄金时期（1955-1999）在印度工作，曾在德里大学与尼赫鲁大学任教，以后担任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教授顾问。他是1969年开始的非正式中国讨论小组（德里中国研究所的前身）最早的成员。他曾经是首任中国研究所两主席之一，长达十余年之久。他的著作有十本英文书、六本中文书。现为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导言二 SECOND EDITOR'S REMARKS

[印度] 阿密亚·德武 / *Amiya Dev*

即使以最狭隘的感情来说，这本书也应该属于谭中教授。是他设计、安排了书的意向，心中有数地向他理想中的人们约稿，和他们通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研究、思考，甚至“越俎代庖”地帮他们写作——这是头等的慷慨。我们，作为书的作者都见证到了。我本来是作者之一，后来被邀变成这本双语书的编审，负责编审英文内容。当然，我答应以后就失去了许多自由——那种自我写作、与别人无关的自由。但我所得到的却极为丰富——有机会和一位杰出的学者又是最忠诚于泰戈尔文明理想的人一同工作。他这种忠诚不同凡响，我有机会每天和它的温暖接近。我是泰戈尔出生的城市加尔各答的居民，庆祝泰戈尔诞生150周年的活动早就在这儿开始了。

我作为编者已经三个多月，除了刚开始三个星期以外，几乎没有哪一天我没有和谭中教授电子通讯。我们的编辑部颇不寻常，他在芝加哥，我在加尔各答，他的联络人以及我们的出版者都在北京。有一阶段，形势有些急迫，他称自己为“湖南牛”，决意要忍辱负重。我对湖南了解不多，只知道毛泽东和谭云山都是湖南人，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显示出湖南人是大有作为的。诚然，如果不是湖南牛，谁又会自找这样的难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出这样规模的双语书来呢？！我赞赏湖南牛。

当编审就像当下手。泰戈尔说过：这世界不在你掌握之中，有别人在掌舵，他会带领我们前进。我的感觉就像这一伟大比喻的一种贬值。我难道没有焦虑的时刻与受挫的感觉吗？谭中教授与我的通讯恐怕就是最好的见证。真的，有时候不免疑惑，甚至争执，从我这当下手的来说，我们各持己见。我认为自己在论理，但可能不是论理，而是自以为是地坚持正义。也许，我有点以能说泰戈尔的语言、掌握第一手资料而自豪，因此就不那么为本书的读者着想。这再次显示出谭中教授的宽容大度。

而且，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怎能称职地“编审”同仁们的英文呢？岂不是瞎子引着瞎子走路，或者说是一个不那么健全的人走在比他更不健全的人的前头呀！我起的作用大多是给“i”字母加上一点，给“t”字母加上一横而已，绝对不曾去改变作者的独到的风格。如果读者有文字通顺的感觉，那就是作者的赐予；如果读者感到哪儿有些不流畅，那就很可能是由于我的轻浮。无论如何，书的内容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标准化。本书拼音采用英国人的习惯，但动词却用“z”来代替“s”，“analyse”是个例外。当然，凡是引语，我们就不干预，保存原作者的拼音格式。如果是整段的引文就不加引号，若是行文中出现“引语中的引语”，则单引号（‘’）与双引号（“”）并用。^①括弧“（）”与“[]”按照惯例，当然也会出现例外。关于注解，我们是新旧方式兼用，为使读起来方便，绝大多数注释放在文尾。我们尽量提供信息来源。

把印度字罗马化有个附加符号（diacritical marks）的问题。关于梵文字，附加符号已经统一，但孟加拉文却不如此。要在孟加拉字的罗马化上加上附加符号必须有个合理的规范，我指的主要是人名、地名、书名等以外的一般的字。与梵文的语言不同，孟加拉语只有“b”的音，没有单独的“v”音，因此我们采用“*Rabīndra-Racanābalī*”，而不是“*Ravīndra-Racanāvalī*”，但是也有例外，国际大学的名字就是“*Visva-Bharati*”，我们一般用“*viśva*”而不用“*biśva*”，还有“诗歌”用“*kāvya*”。这些都是妥协，考虑到孟加拉语发展的迷人的历史，这些妥协也都不坏。要使孟加拉文的罗马字的附加符号完全统一必须实行强制，我却没有这一能力。而且强制的统一化也会违反历史发展。

我时时刻刻需要帮助，帮助的内容小至纯机械的问题，大至必须的思想指导。我对电脑等电子技术一无所知。关于这方面，我得感谢沙玛尔·帕塔查利亚（Samar Bhattacharya）、沙雅明杜·达斯古普多（Sayamindu Dasgupta）与苏帕·达斯古普多（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在思想指导方面，我很感激舒林·帕塔查利亚（Sourin Bhattacharya）帮我弄清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我也经常向沙潘·摩炯达（Swapan Majumdar）请教，特别是有关资料与日期。还有普拉纳布·毕施瓦施（Pranab Biswas）帮我查阅文献，舒侃塔·乔杜里帮我看出引语中的遗漏，阿锡施·赖赫里（Ashish Lahiri）回答我的疑问，特里迪普·舒罗德（Tridip Suvrud）从艾哈迈达巴德，普拉波德·帕里克（Prabodh Parikh）从孟买寄来快速电子邮件回答问题，再加伊普喜姐·钱达（Ipshita Chanda）打电话来讨论我的编审，我对他们以及那些没有点名的直接与间接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激。

我想说一两点对本书的感想。有些编者甚至把每篇文章都总结一番，我不这样

① 请读者注意，这是翻译德武教授的英文“编者的话”，他说的这些都是英文文章中的问题，和中文的格式无关。——谭中

做，不想干扰读者自己随意翻阅的闲情逸致。但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本书的课题是“泰戈尔与中国”，书中有中国与印度学者的探讨。也就是说中国本土与印度本土的观点共同汇合。很可能这是第一次对泰戈尔1924年访华汇集了如此多的信息资料与观点。过去不同书中或文章中有过不少的零星讨论，但这样集中在一本书中可能还是首次。刚开始时主要是有关访问的一些细节，当然不忽略某些方面的批评，但要用正确的判断来对待批评。这是许多年前达斯（Sisir Kumar Das）和谭中就开始了的，到了本书可以说是有了某种收获。我们不仅有新的中国资料——谭中本人大力参与其中——同时也有了来自印度的新鲜观点。泰戈尔的1924年访华是一个焦点，另一个焦点当然就是中国学院。任何人读了泰戈尔在中国学院开幕典礼上的讲话都会感触到他讲话的内容与感情，是诗人在作散文。如果从新的角度来看泰戈尔访华并能把徐志摩（泰戈尔的“Susima/苏诗玛”）的彩色照片冲洗出来，那中国学院就充分显露出谭云山的平生事业。但每一个开头都有一个开头，因此就必须查阅孟加拉文资料，不这样做就不能做好我们的“泰戈尔与中国”课题，也不能做好泰戈尔与亚洲的课题。四十年前斯蒂芬·哈伊（Stephen Hay）的理论至今仍然到处留下其阴影。如果不和他的理论调解就可能不会欣赏泰戈尔所说的文明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他那样不赞成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一方面聚焦于跨越喜马拉雅的大同理想，另一方面聚焦于泰戈尔的国际主义“*yatra visva bhav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相会。

我也邀请读者注意到本书提供的“泰戈尔与中国”的另一面牵涉到的诗歌的探讨。泰戈尔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难探讨详尽的，但本书提供了一些认真的研究。泰戈尔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在本书中也有了探讨与争辩。我们能否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眼光来读泰戈尔的诗呢？可能这一辩论使我们认识到必须从他自己的文化来看泰戈尔，来认识这世界天才中最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但是字面的象征符号，而且是一切创造性的标识的这样一个人物。只有这样，我们的“泰戈尔与中国”的主题才能使人信服。

阿密亚·德武，原任加尔各答的贾达夫普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著有多部孟加拉文与英文专著，发表过大量文章，包括泰戈尔以后的两位孟加拉诗人的传记。他和其他学者合编的书也很多，包括与西锡尔·库玛尔·达斯合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与欧尔·罗伊·迈纳尔合编的《诗歌的更新：抒情诗概念与实践的革新》，与斯蒂芬·尚克曼合编的《史诗与其他高级叙述：跨文化研究论文集》。这最后一本书是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编的，他任该会的副主席。退休前最后的职务是维迪亚萨加尔大学校长。